

# 年青國中寄再

著三洋原大



行發館譯編化文方東

大原洋三著

再寄中國青年

東方文化編譯館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三月出版

中  
年  
寄  
青  
再  
國

原著者 大 原 洋 三

譯述者 東方文化編譯館

發行者 東 方 書 局

中央印 刷株式會社

上海咸陽路三十號

平野淳太郎

上海香港路一一七號

定價每冊國幣

外埠酌加郵費

---

---

一、緒言.....	一
二、大東亞之道義及其實踐性.....	七
三、中國不平等關係之清算.....	十四
四、中國國內行政整備.....	三九
五、中國國內統一之可能性.....	五五
六、大東亞建設與英美之戰爭目的.....	七三
七、結論.....	九四
追記.....	九八

---

## 緒　　言

這本「再寄中國青年」的書，是前年昭和十七年，即民國三十一年秋季所刊行的「寄中國青年」的續篇。當「寄中國青年」問世的時候，雖然是在日本的所謂對華新政策，尚未被稱諸飛躍的實踐以前，但現在回顧起來，日本政府從這時候起，已經預期到對華政策的飛躍的實踐，而堅固着其決意和準備的時期了。「寄中國青年」雖然完全是偶然的符合，但是，使這種空氣能進而反映出來，對不久行將到來的日本政府對華政策的飛躍的實踐，可說是完成了開平思想基地的使命的。我們在「寄中國青年」之中，會從各種不同的角度觀察，努力探求過：本來在協力關係以外的方式上，不能完全相互存立的中日兩國，在過去的幾十年間以來，總是互相反目，而終於見到中日事變的發生，形成東亞同胞互相鬪牆的悲劇底原因。於是，在很多的原因之中，指摘出：在中日兩國雙方，各自對於對方國家缺少理解；對於對方國家，不會充分反省自國底態度；更追遡上去，從太過於蔑視中日兩國所持有的本然的姿態，獨自的東洋的與亞細亞的思想，以致陷常對

於英美思想的錯誤的追隨渴仰等等事情，因之中日兩國民間的感情，更行次第地加深了疎隔的鴻溝；乘此而起的英美以及其他第三國的策動，就中英美的所謂分割支配政策，在這場合就成為中日分離政策的悲劇底最大的原因了。於是，更強調了：現在正是由大東亞戰爭中，可能將英美的勢力完全從大東亞地域排擊出去的當兒，中日兩國國民應該活用在經過數年不幸的東亞同胞相爭而來的，中國事變的悲劇中瓦相所悟得的教訓，大東亞戰爭所獲得的戰果，以及大東亞的新的情勢，中日兩國已經回復到自國底本來的思想文化上，以及在中日雙方相通的，東亞的，亞細亞的思想文化上，昂揚起互相理解和信賴的時期了。更進一步提高中日雙方的理解和信賴底方法，是日本對於中國的獨立，中國的統一，中國的主權的完成，應該全面徹底的尊重和協力；而中國也應該不再迷惑於英美的似是而非的人道主義的空虛宣傳，或是巧妙的中日分離政策，而清算對日本的輕侮。這樣由於中日兩國互相的協力，而使各自底國力富強，真正成爲大東亞建設的中核勢力；從而，中日雙方應該不僅滿足於各自國力的能增進而一直的努力，更應百尺竿頭進一步，互相是提携協力，應該傾注整個挺身的力量，從英美底桎梏中解放出來，以獲得大東亞的安全，大東

亞的繁榮，以及大東亞的恆久和平；這樣在率直地披瀝之下，要求中國青年諸君的考慮。

「寄中國青年」，就於這一年十二月，在上海譯成中文，其次出版了英譯；可是曾經有一個在日本留學中的中國女學生，讀了這書以後，在感動之下，趁學業的餘暇自行譯成另一本中文譯本，來要求出版；也有在中國鄉村的多數青年，寄來了讀後的感想。此外，「寄中國青年」，在上海的中國青年座談會，或懇議會之中，也會被作為議題而討論過；「也常常有對在上海旅舍中的筆者，傳聞了那結論，更說述了希望，質問了認為是疑惑的地方的人。疑惑的要點是：這樣的思考方法，究竟是否為日本朝野所同意？日本的朝野，是否能把這當作日本軍的實踐政策，而移諸實行呢？」對於這點，我就告訴他們說：如果能假以些少時日的話，就能有比我口頭回答來得更有效的，由日本的朝野和日本軍以躬行實踐來作回答的。對於這個回答有首肯的青年，但也有依然殘留下一抹疑惑的言語，告辭而去的。

「寄中國青年」的小冊子，當在中國的思想界興起這樣微小波紋的當兒，中日兩國的關係，已經進入可喜的快角度的轉換期了。這是：在昭和十八年，即民國三十二年的一月九日，發表了『

中華民國日本國間關於返還租界及撤廢治外法權等協定」以及「關於協力完成戰爭中日共同宣言」在這以後，中日兩國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各部門的協力關係，更有了驚異的發展。又，在這前後，廣大的大東亞天地，絡繹不絕的發生了使世界震驚的重大事件，在戰爭最緊張之中除了使人的心明朗而外，同時更為緊迫起來。這是：緬甸的獨立，菲律賓的獨立。這是：大東亞會議的舉行，大東亞共同宣言的發表。大東亞共同宣言，是包括了中國及大東亞各國的，這並不是對誰何的顧慮，並不是因為誰人的命令，而是在真正自由平等的境地上的大東亞的道義的流露，僅是由大東亞各國所起案的大東亞底基本綱領。是要獲得完成真正自由與平等的大東亞戰爭，防衛大東亞與建設大東亞的根本推進力。因為這樣，大東亞各國的大東亞，才能雄壯的建築成功。大東亞各國要以掀天的氣概互相協力，以完成大東亞為目標而出發的。

在「寄中國青年」的書中，我們最加強調的根本主張是：國家間的關係不是對立的，而是協力的。說這是過於理想的議論，在日本雖不是沒有，但從中國的青年諸君那兒聽到的似乎來得更多。雖然如此，從去年的春天起直到今日為止，日本所付諸實行的政策，大都不是以對立為本位，

而是以協力爲本位的，因爲這樣，中國的獨立才能向完成邁進巨步，而得繼續進向完成大東亞的建設，大東亞的防衛。即使從事於對立底侵略底征服的英美底反擊，有時能在太平洋的各島嶼上多少獲得一些成功，但這也並不能支配大東亞戰爭的大局。這不過是在終局上的一時的微小的現象而已。更進而進行大東亞的建設，並完全封鎖英美的企圖，使英美縮轉他底手去的時期，是決不會太遠的。像看到末梢現象的英美反攻，以爲權利超過道義，或者是對立超過協力，認爲把它作我們底指導精神來得有利的這種團圓吞棗的思想，是決然不能加以採用的。

作爲這協力的根底的，是大東亞的各國互相尊重其自主獨立，互相承認富強，互相作全幅的援助。協力真的能够發揮它的機能無餘，那末是協力者的每一國家，都能够成爲富強的國家了。這正和鍛鍊的每一環能愈加堅強，則全班的力量便更能堅固，是同一個道理。在以對立作爲指導精神的場合，各個國家在達到富強的時候，就互相埋下了抗爭的種子，這到底是否被允許的事情，祇有以協力爲指導原理，大東亞各國各自成爲富強，才沒有任何的障礙，不，當然還是因此，才能完成真正的協力體制。因此，才能完全獲得從英美檯階中解放出來的大東亞底防衛和建設。我

們的這個主張，由了日本的對華新政策，日本的對南方政策的實踐，已經被絡繹的在如實地證明的今天，萬一在中國青年諸君之中，有拘泥於過去日本對抗英美的時代政策的歷史，對於我們日本青年底信念上的道義至上持有疑惑，而對於日本依然懷有感情的誤解者的話，這實在是絕大的錯誤而忽視了現實的人。在我們，以事實爲事實而正它，是絕對必要的。

在『寄中國青年』的書中，我們主張道義和協力，強調這實踐力量，一點也沒有錯誤。我們更在這『再寄中國青年』的書中，所強調的是進而力說從中日協力關係而到大東亞的協力關係，不僅是中日的青年，而且是大東亞的青年都須透徹這個信念，站在這基礎的上面，向大東亞戰爭的完成，大東亞的防衛和建設上邁進。這率直的主張，又能得到中國青年諸君的贊同，是確信而無疑的。現在少數的中日兩國的青年，乃至大東亞的青年，如果能够虛心坦懷促膝交談，互相討論，那麼，這我們的所信不僅是中日兩國之間，一定也能成爲大東亞普遍的青年底主張和信念的。我相信這正和大東亞會議時，各國代表虛心坦懷的起草大東亞共同宣言，把它作爲指導綱領而予以發表，把這嶄新的銳意不絕的移諸實踐，是同一的性情，和同一的過程的。

## 大東亞之道義及其實踐性

日本的對華新政策的實踐，是遵照去年一月九日「關於返還租界及撤廢治外法權等協定」，而首先從返還租界開始的。

收回租界和撤廢治外法權等，是被尊崇為中華民國的國父的孫文先生，在他那革命尚未成功的遺囑之中，所特地指示出來的中國和各外國間底不平等關係的，清算上的具體的表現。租界的交還和治外法權的撤廢，已經是幾十年以來的自日本以及其他各有關國家對於中國當作原則而約定的。日本則於昭和十五年，即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自行在「關於中華民國日本國間基本關係條約」底第七條中，重行加以約定，但一月九日的協定，更進而表示出了有急速實施的決意。中國在民國十六、七年以來的幾年之間，也會有過驅使所謂革命外交，以圖一氣呵成地解決不平等關係的時代。收回漢口、九江的英國租界，就是這個先驅。接著對於治外法權問題，與不平

等條約，由中國單方的廢棄了條約協定，選取了爽利的解決途徑。可是，在中國青年之間，於強烈而且正直的國家意識昂揚之下，這運動，首先便向不愧於獨立國之名的完備的國內行政的路途，累次認真努力。本來，有着彪大版圖的中國，要想急速地收穫到這成果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但這可悲的中國底熱情和努力，使曾有過同樣苦痛經驗的我們，不受感動是不可能的了。因之，日本在一旦決意急速實施交還租界之下，這決意在同年三月三十日就有天津，漢口，蘇州，杭州，廈門的日本租界的交還，更交還了北京公使館區域的行政權，其次是交還廈門鼓浪嶼的行政權，及八月一日的交還上海共公租界，都迅速相繼地付諸實行。而和這前後，法，義的租界，也有的已交還，有的已經接收，由了中國的參戰，和已經收回了英國租界的事實相期，遂了中國多年想要收回租界行政權的宿願。使希望中國早日完成獨立的我們，也得和中國的朝野同其喜悅了。還有，關於撤廢治外法權，爲了審議這實行方法，而在簽訂協定之後，立即由中日專門委員予以組織，作爲撤廢法權的第一階段，簽訂「關於中華民國對日本國臣民課稅之中華民國日本國間條約」於是，在華日本僑民對於中國的課稅必須服從法令，現在僑居的人民已根據協定，而負擔着應

分的課稅了。

日本對於尊重中國獨立，主權完成的協力，並不僅此而止，而且更有了劃時期的發展。這是到了十月三十日，那昭和十五年，即民國二十九年中所締結的中日基本條約被廢棄了，重新締結「中華民國日本國間同盟條約」，並且同時約定『於中日兩國之間恢復全般和平，戰爭狀定終了之時，應撤去派遣於中華民國領域內之日本國軍隊』，以及『放棄關於北清事變以北京議定書為根據以及有關文件中之駐兵權』。這十月三十日的同盟條約的締結，和關於撤去日本國軍隊的附屬議定書的簽訂，對於日本國的誠意，及其對於中國主權的完成與獨立之尊重，關於日本協力的限度以疑惑的眼光讀過「寄中國青年」的人們，給與了一種決定的回答。日本對華實踐政策的這割時期的發展，以及對於中國的這種協力，是比在一月九日所約定的交還租界和撤廢治外法權，更前進了數步，因了這，完全地達到了孫文先生的宿願，也真正地完成了中國的對外政策。日本採取了這樣公正的態度，把這向中外闡明以後，其他的有關國家，關於租界問題，治外法權問題，不平等條約問題等，就不能對日本公正的態度進行，其將追隨這點而來，是當然的事情了。目今

，在世界戰爭最熾烈的當兒，即使有從各種國際關係上躊躇着其態度的表明，或是不問是否而不得不採取曖昧態度的國家，然而這是過渡的事態。這些有關國家不久將倣效日本的先例，完全地承認中國主權的獨立，是既定的事實，已經成爲只是時間的問題和手續的問題，是比見火還要明瞭的事情了。

日本的這種對華政策，當時是被稱爲對華新政策的，這樣，就發生了所謂這不是新政策而是實政策的議論（註：日本的讀音，新和真完全相同）。這政策是由於日本的先覺者在數十年間倡導而來的事情，中國的人士也明白了。就中在第一革命當時，作爲中國革命同志的一人而活躍的北一輝先生所著底「中國革命史」，在讀過的人就會感慨甚深地聯想起這個事實的；但是，這政策的主導者，決不僅限於北先生一人，尤其是從日本的肇國精神，日本的道義上來思考，這政策正是日本朝野多年所懷抱的希望，在這意味上，決不是新的政策，而是該呼作真的政策的。不過，另一方面，把這政策呼作新政策，也並沒有錯誤。這是說：這政策雖是由了日本朝野多年所抱懷，所倡導的政策，然而爲了對抗英美在東亞的侵略勢力，英美在中國的分離中日政策，日本在守

護本國和守護中國上，到底這難以期待完全實踐的客觀事態，長時期間的支配了東亞的情勢，在日本雖非本心，有時也不得不實行和這政策並不相符的施策和事項的。假使要舉出簡單的例子來看的話，如果在日本完全地交還了在中國所有的日本租界的行政權之際，英美却依然保持了上海公共租界的行政權，或者在名義上雖舉行了交還行政權，而在實質上仍然殘留着左右上海公共租界行政的力量，足以控制中國使行行政權那樣的事態時，或者這並不是假定，而是作為現實的問題英美底施策，是向這一方面進行而來的話，在這種狀態之下，日本的交還租界，結果單是在中國使英美勢力相對的增強，中國此後，不，結果當然是更甚的成為英美侵略勢力的犧牲品，在日本方面，雖然是企圖交還租界，但也可說是沒有實行這個的機會了。這在大東亞戰爭的結果，中國是不必說了，即使是大東亞的地域之中，也已經完全地排擊去了英美的這種侵略勢力，英美的分離中日政策，也沒有了施行的方法而終結了。日本果敢地將先時所懷抱的對華政策，堅強的施行起來，中國想要完成而未能完成的多年宿願，也就消失了障礙了。這樣，日本方始能將先期準備的政策移諸實踐，飛躍而迅速地加以進行。畢竟，日本豫期所懷抱的對華政策，得到能飛躍的

實踐的，新的客觀底狀態的大變化，是因大東亞戰爭的結果而發生的。所謂在適應新事態底政策的意味上，就是喊做對華新政策，也決不會錯的。在這裏，不絕的產生了大東亞的新秩序。所謂大東亞的新秩序，決不是以日本底利益爲中心的秩序。而是說：顯示出了萬邦各得其所的日本的堅國精神，東亞的各國各自恢復其自主和獨立，而互相協力建設大東亞。中華民國對外完成了獨立，真正地獲得其所，向完成新中國一路上，策駒前進，同時，像緬甸和菲律賓也重新獲得獨立，在這基礎之上凝固大東亞的協力狀態，大東亞的各國如此地向大東亞新秩序的建設邁進，作爲新的歷史動向之一的表現，那麼，這一次日本底對華政策之被喊作對華新政策，也是可能的吧。

日本的這個對華新政策，雖是以一月九日的交還租界，和撤廢治外法權協定作爲具體的開步，但這是爲了和中國的參加大東亞戰爭，雖即在和「關於完成大東亞戰爭之中日共同宣言」，同時，但世上往往作爲日本之對華新政策，在中國參戰的對償之下，誤解以爲從利害的打算上所採擇的方法，洵是無限的遺憾。對於完成大東亞戰爭，自大東亞戰爭發生當時起，中國就不惜任何廣汎的協力，我們受到很大的銘感而不勝感謝，另一方面國民政府對中國的仇敵有佈告宣戰的希望

， 在中國的民間也有對這相和之聲。這氣運成熟之後，就有一月九日「關於完成戰爭之協力」的宣言，即中國的參戰。因為這和日本的對華新政策的發端是同時日的緣故，以致被認為是利害的打算，甚至說日本為了脫去這窘境的方便，以對華新政策為好餌，而引誘了中國的參戰，實在是詭辯之至。從英美的世界制霸，侵略政策中解放出來的大東亞的各國，互相協力為了恢復大東亞本然的姿態，所謂新秩序的建設是必要的。為了建設新秩序，以基於道義的大東亞政策飛躍地付諸實行，屬於大東亞的諸民族完成其自主獨立，是第一要件。對華新政策就是這一連的一環。其間像英美善於施行過的外交的待機，或是交易之類，完全沒有必要。因為是相互的誠意和信賴，從而親和是一切的根幹，一切的基礎，作為大東亞建設的一環。為了援助中國自主獨立的日本底對華新政策，和大東亞戰爭共同完成，使大東亞建設的基石先行穩固的中國參戰，是沒有被利用於外交或是待機的理由的。中日雙方的國內醞釀了準備和氣運，然後同日的被實踐起來，是這事實的真相，把這解釋為利害關係，是英美的理解方法，同時也是他們所施的反宣傳。東亞新秩序的建設，在東亞各國打成一片，互相在誠意和親和之上，造成永久和平之時，英美對這，恐怕